

前车之鉴

二十五起经济犯罪案件剖析

4.305

责任编辑：郑 众
封面设计：关 肇
封面题签：章 林

前 车 之 鉴

Qian che zhi jian

——25起经济犯罪案例剖析

《前车之鉴》编辑组 编辑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毫米 1/32·印张 5 14/16·字数 117,000

1985年12月第1版 1985年 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19,400

统一书号：6093·14

定价：0.60 元

前 言

1982年，党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两年多来，在中央和省委的领导下，我省开展这场斗争取得了重大成果。揭露出数以万计的走私贩私、贪污受贿、投机诈骗和盗窃国家或集体财产的经济犯罪案件，沉重地打击了经济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狠煞了猖獗一时的经济犯罪活动。同时也教育了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带动纠正了一些不正之风，促进了党风、民风和社会风气的好转，保证了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政策的正确贯彻执行。

两年多来的斗争实践说明，近几年出现的严重经济犯罪活动，令人触目惊心，其数额之大、手段之恶劣、危害之严重、涉及人员之广泛，前所未见，远比一九五二年“三反”时严重得多。这些犯罪活动，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毒害着人们的思想，污染着社会风气，已经和正在腐蚀着我们的干部队伍，损害着党和国家的肌体。进行这些严重经济犯罪活动的，不仅有社会上的一些不法分子，而且还有我们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内的少数人员，也有党内的一些不坚定分子。其中有的是入党多年的老同志，他们在艰苦的斗争中，没有被拿枪的敌人所征服，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却被糖衣

裹着的炮弹击中了，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的起码立场和品德，变成了资产阶级的俘虏；有的是曾经在各条战线上做出过贡献的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他们曾经在艰巨的任务面前没有低头，而新的考验面前，却头脑昏昏，变成了经济罪犯。他们有的是同社会上的不法分子勾结在一起，有的是利用职权和工作条件，有的是打着国家或集体的幌子从事犯罪活动。斗争的实践证明，严重经济犯罪活动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阶级斗争在经济领域里的集中表现。

收入本书的二十五篇文章，只是打击严重经济犯罪活动中查处案件中的一小部分。今天把这些案件公开出来，目的在于透过这个窗口，让人们看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散布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极端个人主义思想，对党风、民风和社会风气的破坏是相当严重；看到资本主义腐朽没落思想和生活方式对人们的腐蚀；看到经济犯罪分子利用党内不正之风，不正之风掩护经济犯罪活动的事实；看到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严重性、危害性和危险性。从而充分认识开展这场斗争的重要性和严肃性，坚定把打击严重经济犯罪活动的斗争进行到底的信心；同时，唤起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提高坚持无产阶级思想、立场，反对资产阶级思想、行为的觉悟，增强反腐败变质的能力，保持共产主义纯洁性、

对外实行开放，对内搞活经济，这是我们党根据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所采取的从实际出发的坚定不移的政策。事实证明，实行这一政策，国民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很大改善，大大地加快了四化建设的步伐。但在实行这一政策中，必然会有不法分子乘机进行破坏社会主义

经济的犯罪活动，必然会有形形色色的剥削阶级思想乘机侵袭、腐蚀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增强反腐蚀防变质的能力，经受这场长期斗争的考验。要按照胡耀邦同志在党的十二大报告中指出的：“我们在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新时期，从思想上到行动上一定要坚持两手：一手是坚持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另一手是坚决打击经济领域和政治文化领域中危害社会主义的严重犯罪活动”，坚持不懈地把打击经济犯罪的斗争进行到底。

中共黑龙江省纪委副书记

中共黑龙江省委贯彻办主任

张文侠

目 录

前 言	张文侠1
张继伟的犯罪道路	1
起诉科长被起诉	40
一个被腐蚀的党支部	46
厂长、主任、副总编辑	
——孙显峰等三名干部走上违法犯罪道路的调查	50
从公安局长到狱中之囚	54
夫妻双双被押上审判台	59
退休、退色、蜕变	
——韩宝和索贿、诈骗案纪实	63
劳模、赌徒、囚犯	73
难填的欲望 可耻的下场	77
“财神爷”贪财	
——王治是怎样走上犯罪道路的	81
金钱梦的破灭	85
韩岗富的致富路	96
副行长的腐化	107
利欲熏心 终成罪人	
——谭国义、李福友等人的勒索受贿案及其教训	111

私欲驱使他们走上邪路

——陶成林、姚志帮一伙是怎样进行城乡勾结贪污

犯罪的	117
贪财者的自述	122
“老实”的背后	125
伸向少年的一只黑手	130
莫把职权当竹杠	135
“种子专家”的发迹史	140
一对堕落的夫妻	
——孙悦永、卢玉清演变始末	145
一个并不高明的诈骗犯	150
从这里走向深渊	
——物资科长周胜才犯罪始末	153
用钱铺路的“座山王”	157
关于王守信贪污案件的调查报告（摘要）.....	161

张继伟的犯罪道路

依仗老子权势贪赃枉法的张继伟，原是伊春市政府驻哈尔滨办事处接待科副科长。1983年，因受贿、贪污罪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张继伟总计受贿、贪污四万三千三百四十三元八角。其中，他从1980年4月到1981年11月，借“关系单位”求援等名义，通过他的父亲张明轩、叔祖父张成国，先后批出木材一千七百三十八立方米，由他人倒卖，共牟取暴利三十万六千八百元，他从中受贿三万二千五百六十一元；为他人子女安排工作，受贿八千零二十元；利用职务之便，巧立名目，伪造单据，贪污现金一千七百六十二元八角。此外，他还以借买房款为名，非法套取三万三千元现金私藏起来。张继伟作案，完全是依仗老子权势，其父张明轩不仅给张继伟批过木材，而且对张继伟的经济反常现象早有察觉，既没有认真追查，也没有向组织报告，尤其在知道了张继伟的部分犯罪事实以后，仍然不向组织报告，反而为张继伟转移赃款、掩盖罪行出谋划策，进行袒护、包庇。其叔祖父张成国滥用职权，违反政策，先后八次给张继伟批出一千四百八十五立方米木材；他还以权谋私，为其亲属弄木材，少交和不交款，占国家便宜三千元。张明轩、张成国同志身为受党教育多年的干部，但在张继伟犯罪案件中，丧失了党性原则，以

封建宗族关系代替党的政策，支持、包庇亲属犯罪，给党在政治上造成了不良影响，在经济上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

张继伟的犯罪道路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加以揭示。

“胸无大目标，心想大钱包”

“摇钱树，伊春栽，
木材老客八方来，
行贿是把金钥匙，
歪门邪门都能开。”

我初到伊春，有人就问“是来采访案子的吧？”

检察机关向记者提供了一份八页十六开纸的影印件。

这是一篇供词：《我为什么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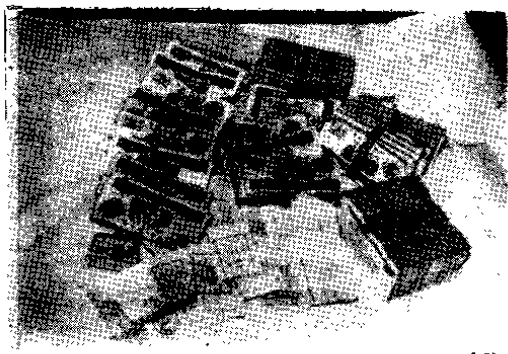
罪犯原本是好青年，七年前加入了共产党，被捕时还不到三十岁。

伊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刑事判决书中，认定他受贿、贪污总计为四万三千三百四十三元八角。此外，他还非法套取出三万三千元现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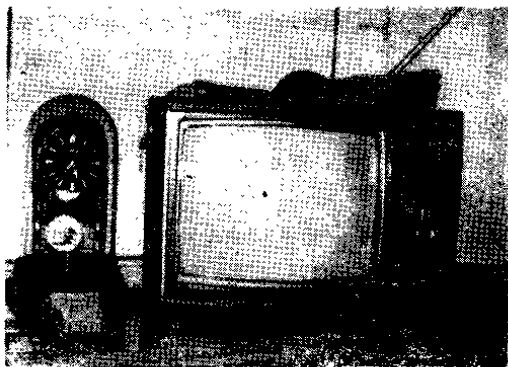
他就是去年三月间破获的“全省头号经济案件”的主犯张继伟。

这起重大案件牵连了他的两个主要亲属：一个是他的父亲——原市委副书记、副市长张明轩，另一个是他的叔祖父——原市委常委、副市长张成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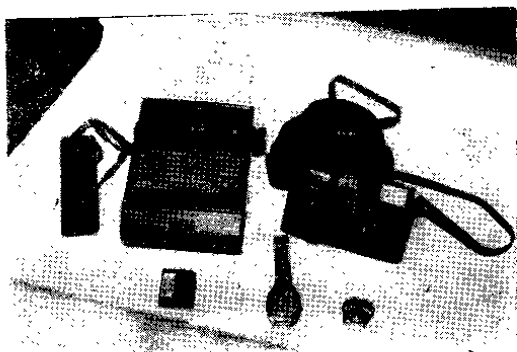
我在伊春多次接触了他们祖孙三代人。去年夏天，经准许，在看守所里我同张继伟无拘束地谈了六个小时……



图一 这是收缴张继伟贪污、受贿的现款及其存折



图二 这是张继伟用贪污、受贿款购置的日本产二十吋彩色电视机



图三 这是张继伟用贪污、受贿款购置的二台照相机和欧米加、上海牌手表

哗啦一声，铁门打开了。张继伟走出来，胳膊甩甩搭搭，身子摇摇晃晃。他的肤色有些苍白了，现出一副颓败的容颜。

坐在铁窗前，我随手给他也点了一支烟。他连连大口大口地吸着，提起一点精神来。

“都说你抽烟很凶，真是不假。你是什么时候学会的？”我开口问道。

“练习写作那年，”他答。“那时候，天天要熬夜。”

“看了你写的几份材料，文笔不赖嘛。”我说：“那你为什么没有沿着正路走下去？”

他默言良久，才说：“还讲那些干什么呢？”泪水开始在他的眼眶里打转转。“我……”他把头低了下去，“我后来把那些全忘了……”

他忘记了什么？先读一段他的供词吧。

“1966年初，‘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十三岁的我，在初中一年读书。那时我对社会陌生、无知。在那‘波澜壮阔’的年代里，举国上下……整天乱喊乱叫……使之文明社会不文明……无政府状态遍地皆是；各树一帜，比比皆是，名曰红色组织等等。由此，大好河山变得乌烟瘴气。我没有经历过事件，心里有点没底，总觉得1966年以前不是一个日月繁荣的光景么？自然灾害我们胜利度过去了，怎么又来一个‘文化大革命’干什么呢？”

“正在自问的时候，我的父母被反省审查了。我们兄妹几个无依无靠了，整天跟着七十五岁的老奶奶相依为命。我每天还去外面打听消息，听听大喇叭，得知父亲又是爬上爬下地挨批斗，内心痛苦已极，回来却不能同奶奶讲。”

“秋天来了，生活曾一度无保障。我和十岁的弟弟挑起了生活的担子，去野外地里拣人家不要的小土豆，拣不成棵的白菜回来作下饭的菜，早起晚归，弟弟还有点不好意思。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和弟弟在野外哭了好多回。在没有温暖的生活里奔波着，盼望父母出来呀！盼望‘文化大革命’以前的生活呀！”

“冬天更叫人难度。家里烧的没有，我和弟弟又拿起了绳子，由于年小体弱，没干过这样的活，无奈上山（拾柴）去了。当时河里结了薄冰，我们兄弟涉水过河，往返数趟。我还得接弟弟过河，因他年小，流急。这样的事在那个年头里很多，如今记忆犹新。”

“中学毕业了，我们上千名同学坐上了北上的列车，清晨

出发了。”他在供词里继续写道：“车上，我环顾周围的人群，都有留恋家乡的心情，后来谈论到边疆、到农村做一名有志气的知识青年，谈理想抱负，才把恋心收住了……就这样在远离家乡、人烟稀少、住无房屋的边疆深丘山谷中扎根了。开荒，种地，打草，盖房，同大自然展开了搏斗。我们都是笑迎朝阳出工，歌送晚霞而归，欢快的劳动送走了多少日日月月。追忆那个时候，没有一点私心杂念，没有想东想西，整天都是天真烂漫，有说有笑。”

他开过拖拉机，当过汽车司机。当年的带队干部说他“那时候确实表现不错。”

1970年末，他应征入伍。“我已经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了。在部队期间，能够严格要求自己，注意政治学习，进步很快。”

他被挑选进了部队的体工队，先打篮球，后打手球。因为他仪表堂堂，部队一位首长的侄女看中了他……但是，他拒绝了。

他有自己的心上人。他说“我俩是一起下乡的，她在我家患难时待我好。”尽管这位姑娘因得了中风症，经医治还是有些眼斜嘴歪，他还是同她毅然结了婚。在她将要临产时，恰逢他得了探亲假。但是，等不得第一个孩子出生，他毅然如期归去了。第二天，他的爱人分娩了，“年轻的父亲却没在身边……他正回部队里……”

这两件事，起码可以证明：他，原来，思想意识是健康的，是守纪律的。

回忆这段珍贵的往事，他在供词里说的是真话：“在那时的艰难的日子里，在那样的社会环境里，我能埋头克服困难，

没有被困难所吓倒，没有走下坡路，完全是因为身上有着正义的东西，美的品质，迸发着精神的火花，充满着希望和未来。”

1975年4月，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在“入党志愿书”上写的第一句话，就是：“我申请入党决不是为了谋求个人私利。”

“我的这些材料，大概你都看过了。”他抬头看了看我，这样说。“可是，我后来……”他又把头低了下去，双手揉着头发说：“我后来怎么会那样呢？变成了一个贪得无厌的罪人。现在想起来，太可怕了，就象是作了一场恶梦，然而又都是真的……”

“各项政策的落实，我的父亲回到了工作岗位。”他在供词里写道：“条件变了，门庭冷落变了车水马龙。我开始一帆风顺。”“总认为自己是干部子女，有自来红思想，根红苗壮”。“特别是到了大城市以后，花花草草，别开生面，开始还有点约束，后来就不在乎了……钱不够用了。”

他有了工资收入，“更觉长大成人了”。随着年龄的增大，他的独立性意向在急剧发展着，而十年动乱造成他的文化水平低下，认识能力低下，这就在他的心理发展中形成了极为尖锐的矛盾，使得他的思维远远缺乏理智，远远离不开直接经验的指导，具体形象思维仍然占着主导地位。于是，形形色色不正之风的存在，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意识和生活方式的存在，把他的独立性意向引上了歧途。

他从部队复员不久，变得越来越懒散了。他打篮球是把好手，可正式比赛，他迟到一个小时才穿着拖鞋出来，苦得全场等他一个人。他去粮店买精粉白面，竟跟人家撕打成一

团，苦得家长去赔礼道歉。工作嘛，想上班就上班，想休息就休息，如他所说“无利不出头，无钱不使劲”，学会了用自己管到的、能搞到的短缺商品“拉关系，走后门，送人情，换方便”。“这不算啥，”他说：“现在一些人，谁把这些鸡毛蒜皮的当回事呀！”

他犯了生物性的态度轻率的错误，惹得群众指着他的脊梁骨，成了单位里“不受欢迎的人。”他说：“我没有勇气向组织谈。我害怕了。我想偷偷地改。我得收心了，求上进了。”在此以后，他果然坚持在业余时间里，由当地报社一位编辑辅导，学习写作了。节假日也不间断，天天熬夜，这样坚持了一年多。当时，人事部门对他作了考察，评语是“工作积极肯干，能认真钻研，本职工作能按时完成，能胜任现职工作。”单位的文字材料，几乎全出自他手。在他不满二十八岁的时候，就被提拔为秘书科副科长。他说他在当地“同年龄中是个出类拔萃的人物了。”

但是，他又说：“你是知道的，搞文字工作，我还捎带管点总务——吃喝拉撒睡的，太苦太累，总得熬夜，有功还不显功，我受不了。”

“那你又不想求上进了？”

“我何必那样吃苦受累地求上进呢？”他这样回答了我的问话：“我的家庭条件优越。不是说得‘比爹’吗？靠我父亲和老（叔）爷这两块牌子，很多事情就不难办了。单位买汽车、批木材、搞基建、搞福利……我一去办，马到成功。单位为啥专门让我去干这些事？我当然看出了这条门道。”

“再说，我二十七岁就当了副科长。看我原来那单位科长

以上干部，没有一个是四十八岁以下的。再过十年，我当个局处长还能成问题？！”他略微停了一下，又说：“我想了又想，何必吃苦受累地求上进呢？我随俗入流就行了，又不想当更大的官，凭我的条件，只要凑合好了，坐等自然淘汰，当个局局长，不成问题。”

“这样想，”我说：“你对于‘明天的憧憬，就心地非非’了。”

“是的。”他说：“我在供词里是这样写的——‘心地非非’了。”

“‘心地非非’具体指的是什么？”

他解释说：“有个好的小家庭；有所好的住宅；有高档家具；手里有钱花，银行有存款；衣着要阔气、风流；待人接物要讲究……现在一些年轻的不是时兴这套么？我也随俗入流了。”

他开始“学着给人家办事了”，但是，主要是“公对公”。他说，“我个人只从中得一点小便宜。”

他有个老同学，叫滕亚利，原来也是伊春运动员，后来“活动”到北京当了公共汽车司机。1979年夏初，滕回伊春托他办木材，指着他那台“试看”的九吋电视机，开口就说：“继伟，你这台电视机也该换换了！”他心领神会，关上房门，俩人在小屋里嘀咕上了。几天后，滕打发人给他送来了五百元钱……

他追忆说：“拿到钱，我很害怕。当时我认为这钱不是好来的。这不是好事儿，早晚得……这五百元钱到手，我没敢花；拖了十个月，我也没给他办木材。”

这期间，他确实帮人办过几笔木材。他说：“收点礼，占

点便宜，也就够意思了；成百上千的要人家钱……我怕出事。”

那能维持多久？本文开头引的那套咯儿，在当地逐渐传开了；甚至在国营旅社走廊里，木材老客大摇大摆公开谈交易：“你有木材调令吗？多少钱一（立方）米？”

滕亚利也一封接一封地来信，催他赶快办。滕对他说过：“别怕，弄张脚了——我兜着。”

“事实证明，我以前的思想是经不起风吹草动的。”他在供词里这样写道：“在顺利成长中，总认为经过了务农、当工人、当兵，入了党……所以，不愿意正视自己的缺点、错误，以我行我素自居……长此以往，对于善与恶、美与丑、是与非完全分不清了。”

他“动心了，干上了”。1980年春天，滕又派人来，他通过叔爷张成国批出七十立方米木材调拨令，从中受贿一千二百元。

他说：“第一次干，没被发现。我就想，这么点钱，出了事，我父亲也能管。以后，我又想不能抓我。若抓我，我父亲能知道，我再去坦白……”

那年4月，外省某单位求他办木材，他只是收了人家两瓶老醋和将弟弟去北京的一张火车票让人家给报销了，除此没想要别的“好处”。而在同年7月，他又给这个单位办木材，竟连上次加在一起从中索贿一千多元，外带一台自行车。“‘二十响’（指香烟）不顶事儿了；‘手榴弹’（指酒类）顶一阵儿了；写字台、大立柜、录音机、电视机不缺了；若想办成事，得动‘老五’（指人民币五元券）、甩‘大白边儿’（指拾元券）了。”他又这样“随俗入流”了。